

博物馆展览中文物阐释的多维视角 ——以“山宗·水源·路之冲——一带一路中的青海”展为例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in Exhibitions:
Taking the *Qinghai in the Belt and Road* as an Example

倪 翀

Ni Chong

(首都博物馆, 北京, 100045)

(Capital Museum, Beijing, 100045)

内容提要: 文物蕴含着多元、丰富的信息, 在特定的展览语境下, 构成阐释展览主题、传播美学、引起参观者共情、服务公共文化、推动学术等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本文从博物馆展览的角度出发, 运用博物馆学、文物学、诠释学、符号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 以首都博物馆举办的“山宗·水源·路之冲——一带一路中的青海”展为例, 分析展览中文物的内涵和外延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文物阐释 文物价值 公共知识 丝路交流

Abstract: Cultural relics with diverse and rich information, in the context of exhibitions, constitute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theme of the exhibition, disseminate aesthetics, arouse the empathy of visitors, serve public culture, promote academic and other aspects of value and signific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seum exhibitions, this paper uses the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museology, heritage studies, hermeneutics and semiotics to analyze the important role of cultural relics in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exhibition, taking the *Qinghai in the Belt and Road* exhibition of the Capital Museum as an example.

Key Words: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cultural relic's value; public knowledge; exchange on the Silk Road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首都博物馆于2019年2月28日—6月30日举办“山宗·水源·路之冲——一带一路中的青海”特展, 集中展示了442件(套)文物。项目组先后赴西宁市、海东市、海西州、海南州、黄南州、玉树州等地

区, 与青海省文博专家交流, 了解青海各地民族风情, 考察青海地区的文物情况, 并深入展厅和库房挑选文物。笔者有幸参与相关工作, 拟结合理论和实践, 探讨文物在博物馆展览中的阐释作用。

一、博物馆展览语境中的文物阐释

文物藏品是历史的见证,博物馆运用文物藏品举办各种类型的展览,并与辅助展品、文字图版说明、多媒体、互动体验等共同组成阐释元素,以博物馆特有的“语言”方式为公众和社会服务。“博物馆里的展品不仅仅是供人们观看的,更重要的是,它们能够向我们展现事实和传达观点。”^[1]展览成为传播媒介,文物藏品在博物馆展览中转化为阐释的符号,不同的文物在特定的展览语境下,构成各种意义。戈登·安巴克(Gordon Ambach)认为,“所有的博物馆活动都是‘阐释性的’”,“收藏或挑选藏品来布置展览,对于博物馆员工而言,本身就已经是对藏品的一种阐释。博物馆员工在博物馆主题内赋予藏品重要性,并预判观众对观赏文物或艺术品的期待……就某种意义而言,博物馆阐释(或教育)是博物馆——有意或无意地——向公众传递信息的一种多层面过程”^[2]。

文物离开“原境”后,空间发生变化,“一件物品在成为博物馆藏品之前,它必须与原环境存在密切关系,并且能够从原环境中剥离出来。该物品一旦从原环境中剥离出来,其之前所具有的某些价值将会丧失,但与此同时,该物品将在收藏的新环境中获得展览价值”^[3]。

“‘去情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和‘再情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是一组交互作用,切换自如的因素,发生在物质、物质组合、空间和景观等多个层面。物质脱离原生或者再生情境进入博物馆情境,物质组合可能经历多次拆分和组合的循环……两者也贯彻博物馆生命始终,入藏、展陈、研究、阐释等每个环节都既是‘去情境化’进程,又是‘再情境化’进程。”^[4]这就需要按展览类型和内容选择符合主题的文物进行阐释。当参观者进入展厅,首先看到文物的外观,如大小、颜色、形状等,形成第一印象,通过立体、真实的物品获得视觉感官的初步体验。文物的艺术感染力、可欣赏性能够最直接地唤起参观者的视觉体验,但堆砌过多精美的文物,易使参观者产生疲劳。通过不同文物的对比,使参观者保持对展览的兴趣,平衡科学与艺术、逻辑与想象,帮助参观者融入展览,用感性和理性共同构建自主学习,实现参观者在心理、视觉、认知、情感上的共情。

所以,选择文物不但需要感性认知,而且需要理性认知,从博物馆的功能,特别是从科普教育和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而非“赛宝”。“漫步(横向地)博物馆展厅,人们看到了一个个具有自身内在含义的物品。而经过一个又一个陈列箱,一个又一个展厅,不同的物品连成了一个连贯的视觉上的‘句子’。只有当人们从地下仓库里精心地挑选出合适的展品,并将它们以适当的顺序陈列在展厅时,这样的连贯才能得以达成。至此,物品便产生了视觉上的意义,正如篇章中的词汇产生了言语上的意义,从而成为博物馆语言中的基本建筑素材。”^[5]文物藏品的阐释意义由每个特定展览来定,因此要尽可能避免刻板印象和受个人“语意记忆之一般性知识”^[6]。文物的数量、内容的广度、思维的深度、参观者掌握的程度等都需要综合考量。借用诠释学中“理解的历史性”、“效果历史”和“视域融合”的理念^[7],拓展自身历史背景、社会环境、文化因素等方面的理解范围。现代博物馆展览选择文物藏品还需要结合实际,开展有预见性的、精准度的、可操作的前期调研和专业评估,并遵守《国际博物馆协会博物馆职业道德(2004年)》的相关规定。

无论博物馆以何种方式来阐释展览中的文物,都要在充分研究和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对历史“理解之同情”和对文物心怀“温情与敬意”。更为重要的是,需要超越文物的物质形式,与参观者形成无限延伸互动,共同探索文物背后历史演变的进程,构建起文物与当今世界的联系。

二、“山宗·水源·路之冲——一带一路中的青海”展文物阐释的多元视角

文物构成展览叙事的物质基础,文物一般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又具有真实性、科学性、学术性、知识性、教育性、观赏性等特征。“物质文化研究范式的多元化也表明物质文化的阐释可能性是多元的,这既源于物质文化本身的多元多面特征,又暗示物质文化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深受阐释者所处情境的影响。”^[8]在博物馆不同的展览语境之下,展示的文物藏品产生多元的文化意涵:首先是文物视觉直观表述

的可见信息，其次是文物隐含体现的无形信息，包括功能、技艺、内涵、延伸意义、学术作用等，最终目的是这些信息与参观者产生有效的交流。

（一）表达展览主题

这个展览以“‘一带一路’中的青海”为主题，按照“求特不求全，抓点不抓面”的原则，以青海在“一带一路”中“过去有地位、现在有成就、未来有前景”为主要内容设计展陈^[9]。因此，展览中每个部分都要着重突出青海与丝绸之路的关联，展现多种文化之间交流的历史轨迹。展览按照年代顺序，上至旧石器时代，下至明清时期，分为“源远流长”“汉风羌道”“吐谷浑国”“吐蕃东进”“海纳百川”“一带一路中的青海”六个单元。每单元的文物按照主题，以一定的逻辑选择，兼顾文化脉络、谱系。将相同或不同区域地方的文物聚集到一起，通过组合构建使其产生“参互成文，合而见义”的“互文”关系，或是在考古类型学、艺术风格学上形成对比、联系。

展览第一单元选择了部分反映早期文化交流的文物。如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和化隆县卡约文化墓葬出土的一组金饰，器型风格受到北方草原文化因素的影响，甚至可能与中亚、西亚等地区青铜文化存在渊源关系^[10]。又如齐家文化铜矛，出土于西宁市沈那遗址，体型较大，推测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礼器，这种“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勾铜矛”作为实物资料揭示了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是从欧亚草原开始的^[11]。

汉唐时期丝绸之路空前繁荣，展览也选择了大量相关文物。如汉代狼噬牛金牌饰，是从北方青铜文化中生长出来的，而流行范围并不限于北方青铜文化地域^[12]。汉唐时期，内陆与其他国家、地区贸易往来频繁。展出的唐代红地中窠对马纹锦，连珠团窠纹、有翼对马纹表现了中亚系统织锦通过丝绸之路传播的轨迹^[13]。唐代鎏金西方神祇人物连珠饰银腰带有七块圆形牌饰，其上的图案可能源自希腊罗马神话。唐婆罗钵文字锦残片，呈现了吐蕃文化的特征^[14]。而吐蕃文化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不断汲取了东西方多种文化的营养。织锦上的文字是波斯萨珊朝所使用的婆罗钵文字，意为“王中之王”“伟大的，光荣的”，与萨珊朝银币中用婆罗钵文

字书写的“神的子孙”“诸王之王”“万王之王”等内容相同^[15]，与文献记载的“钵斯锦”（波斯锦）形成互证。用文物阐释说明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性。

（二）以物证史

文物作为真实、客观的物证，不但蕴含丰富的历史信息，而且记录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承载了人们的记忆。在以时间维度为主线的展览中可按单元内容突出部分文物的史料价值，通过文物使参观者看到历史细节。如“汉风羌道”单元，选取西宁出土的汉代灰陶灶，通过灶的造型结构，灶面模印的鱼、碗、勺、刀等物品，火门边上刻画的人物的衣饰，生动再现了当时的生活和美学特点。此类型陶灶在中原地区多有发现^[16]，也折射出当时青海与中原地区的人口流动、文化融合。在表现“茶马古道”时，选用了明代金牌信符。金牌信符是明代汉藏茶马贸易时，下发给必里卫藏族29族21面金牌中的1面^[17]，是以茶易马的官方凭证，是明朝治理边陲措施制度化的历史见证物。

展览最后的部分突出展示明清时期青海的民族、宗教政策，选取了体量较大的一件文物——明代铜鎏金观音像造像。这尊造像是永乐皇帝为维护青藏地区的统治，赠送给青海瞿昙寺活佛的礼物^[18]，是维系“俾转相化导，以共尊中国”的历史见证。此外还选取了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铜镜、青海省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陶埙等标志性文物，用文物串联起文明的历程。

（三）延伸内涵信息

对应历史时间的维度，文物形成立体的三维空间，构成展览中叙事的抽象文本。“文物的第一重语言表现历史的具体现象，文物的第二重语言则是表现历史的抽象本质。”^[19]展览中的一些文物会将具体的物延伸到具有表征功能的符号^[20]，或是“画像器物”^[21]来表现背后的文化内涵。这次展览中的新石器时代马厂类型鸭形彩陶壶，器身似鸭子，用黑红两彩绘蛙纹，造型反映了对自然形态模仿的意识，纹饰又表现了原始信仰^[22]。

文物的成分和材料来源，透露出隐藏的历史信息。展览中选择的玛瑙十二曲长杯，用整块玛瑙制成，而玛

瑙在古代文献记载中多来自域外。除了文化研究，器身上细小裂纹的形成也许反映了更多未知历史^[23]。此外，民和县胡李家汉墓出土的耳珥琉璃和珍珠、都兰县出土戒指上的蓝宝石、西宁市出土剑璜上的玛瑙等，都可以作为延伸的信息，阐释古代物质文化交流的情况。

文物制作工艺还传达着科技信息。如清代铜鎏金释迦牟尼坐像造像的台座前沿刻有藏文字款，意为“扎什喇玛”，属于西藏日喀则扎什吉布寺的作品，“喇玛”译自藏文，意为“响铜”，可见佛像所用为铜合金^[24]。此外，柳湾遗址出土的侈口彩陶罐反映了新石器时代陶器钻孔修补技术^[25]，喇家遗址出土的圆形玉芯有管钻痕迹，反映了齐家文化的加工工艺和制玉工具。

（四）唤起历史共情

文物从物质载体连接、扩展到心理和精神层面。展览选择展示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可以拉近参观者与文物的距离，引起共情心理。例如柳湾遗址出土的辛店文化彩陶靴，造型与现代靴子十分相似，容易引发参观者的兴趣。另一方面，“当博物馆中的艺术品成为专为审美凝视而存在的对象时，它的精神意义无疑会得到极大的凸现，也就是说，观众能更加专一而又自由地拥有一种象征的领域”^[26]。参观者通过文物看到古人生活的世界，或触发“思古之幽情”，或汲取创造灵感，或沉浸于文物带来的享受，感悟文化的永恒精神。

（五）提升视觉审美

精美的文物在造型、装饰、色彩、材质等方面带给人们较强的视觉冲击，是展览中备受关注的焦点，也反映了一个时期的审美旨趣。如青瓷莲花尊，造型别致，纹饰繁缛，颜色类冰似玉。造型与中原地区的同类遗物相似，是吐谷浑参与丝绸之路长距离贸易的明证。十六国时期的金扣蚌壳羽觞，材质特殊，用整个蚌壳制成，杯口镶金，华丽珍贵，造型似曲水流觞中的羽觞，线条流畅，极具美学观赏性。展览还选用了大量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来展现早期先民们的艺术造诣，参观者可以对器型、文化类型进行比较，而且这些彩陶的彩绘装饰纹样丰富，反映了原始先民的审美情趣。

（六）体现学术价值

一个展览既要选择观赏性高的文物，又要考虑文物的学术价值，不能仅仅成为“视觉景观”。对于艺术的理解和欣赏是因人而异的，一些文物本身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不应因外貌被忽略，例如贵南县拉乙亥遗址出土的研磨器。拉乙亥遗址的发现为研究西北地区的文化发展史提出了新的问题，遗址中既含有大量打制石器和复合工具成分，同时也含有较多的研磨器之类的器物，这种现象可能正是中石器时代文化的表现。表面残留物也揭示了青藏高原地区早期古人类应对高原气候而进行植物利用的情况，对于研究农业起源和经济类型有重要的学术价值^[27]。又如唐代蓝地十字花缣丝，虽然尺寸较小，也不似其他丝织品图案丰富，但它有别于唐代其他缣丝带，风格也与宋代缣丝有较大区别^[28]。对于研究缣丝起源和技术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七）服务公共文化

展览中的文物不仅仅单向输出信息，也是与观众互动的物质载体。借助博物馆的公开展览，文物藏品走出“深闺高阁”，可以使更多的人利用科学途径与方法，对文物的材质、用途、技术工艺和文化内涵等进行多方面探索。同时学者们也要关注文物背后隐含的信息，借鉴、汲取、融合跨学科领域的成果，推动学术研究和交流，彰显文物知古鉴今的时代价值，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更好的公共知识空间服务。

这次展览选取典型器物、特殊器型，以文物为线索，建立起跨区域联系，用文物表征的空间环境和视觉符号从政治、军事、手工业、文化、宗教、日常生活等多方面勾勒出了历史的图景，通过有限的文物表现了无限的历史，再现了青海地域历史以及丝路交流的盛况。一件文物往往蕴含多重内涵，文物展览可以通过文物阐释信息、表达意义，用古今交融的文化魅力和人文关怀打动观众，启迪思考，关照当下。这也要求博物馆工作者不断进行探索，用多重维度思考，并注重多学科交叉研究，多元、开放、互学互鉴。

注释

- [1] 〔美〕史蒂芬·康恩著，王宇田译：《博物馆与美国的智识生活，1876—1926》，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4页。
- [2] 〔美〕爱德华·P.亚历山大、〔美〕玛丽·亚历山大著，陈双双译：《博物馆变迁：博物馆历史与功能读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285页。
- [3] 〔美〕爱德华·P.亚历山大、〔美〕玛丽·亚历山大著，陈双双译：《博物馆变迁：博物馆历史与功能读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203页。
- [4] 徐坚：《名山：作为思想史的早期中国博物馆史》，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2—23页。
- [5] 〔美〕史蒂芬·康恩著，王宇田译：《博物馆与美国的智识生活，1876—1926》，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4页。
- [6] 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15页。
- [7] 〔德〕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378—388页。
- [8] 徐坚：《名山：作为思想史的早期中国博物馆史》，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0页。
- [9] 青海省文化和新闻出版厅会议纪要（专题），2018年第11号，青海省文化和新闻出版厅2018年9月19日印发；《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一带一路”中的青海”展览工作总体方案的通知》，青政办〔2019〕16号，2019年2月21日。
- [10] 王国道、崔兆年：《青海卡约文化出土的金器》，《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5期；杨伯达：《中国古代金饰文化板块论》，《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6期；乔虹：《卡约文化金属制品及其文化意蕴》，《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 [11] 林梅村：《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与史前丝绸之路》，《文物》2015年第10期；刘翔：《青海大通县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考察与相关研究》，《文物》2015年第10期。
- [12] 阿朝东：《青海省博物馆馆藏古代少数民族文物精品赏析》，《青海师专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年第5期；扬之水：《闪烁在史书边缘的记忆——先秦金银器知见录》，《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十四辑），岳麓书社，2018年，第100—114页。
- [13] 许新国：《吐蕃墓出土蜀锦与青海丝绸之路》，《藏学学刊》（第三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3—116页；赵丰：《唐系翼马纬锦与何稠仿制波斯锦》，《文物》2010年第3期；霍巍：《丝绸入蕃：考古学的观察及其文化史意义》，《西北民族论丛》2016年第1期。
- [14] 全涛：《青海都兰热水一号大墓的形制、年代及墓主人身份探讨》，《考古学报》2012年第4期。
- [15] 许新国：《都兰吐蕃墓出土含绶鸟织锦研究》，《中国藏学》1996年第1期。
- [16] 朱津：《论汉墓出土陶灶的类型与区域特征》，《中原文物》2015年第2期。
- [17] 叶玉梅：《明代茶马互市中的金牌信符制度》，《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
- [18] 谢继胜、贾维维：《元明清北京藏传佛教艺术的形成与发展》，《中国藏学》2011年第1期。
- [19] 苏东海：《文物在陈列中的两重性》，《中国博物馆》1986年第1期。
- [20] 〔美〕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著，赵星植译：《皮尔斯：论符号》，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1—49页；〔法〕皮埃尔·吉罗著，怀宇译：《符号学概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8页；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89页。
- [21] 〔美〕巫鸿著，钱文逸译：《“空间”的美术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06页。
- [22] 严文明：《甘肃彩陶的源流》，《文物》1978年第10期。
- [23] 玛瑙裂纹的形成有自然和人为两种因素。如是人为使器物受热，失水产生裂纹，则可能与拜火教有关。
- [24] 王家鹏：《故宫藏传金铜佛像题记及其分类》，《藏学学刊》（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9—238页；马云华：《清宫扎什琿玛造像的来源及像式类型分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1期。
- [25] 李健胜：《从考古资料看青藏高原史前制陶业的发展历程》，《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 [26] 丁宁：《艺术博物馆：文化表征的特殊空间》，《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 [27] 汤惠生：《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初期的考古学文化及经济形态》，《考古学报》2011年第4期。
- [28] 许新国、赵丰：《都兰出土丝织品初探》，《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1年第15、16期合辑；陈娟娟：《缣丝》，《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3期。